

## 『山药蛋』派文学创作

——晋绥首府印象记(二十八)

□ 牛寨中

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,兴县这片红色土地上,宣传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,文学创作也迎来蓬勃向上的新生力量,诞生了“山药蛋派”五战友——马烽、西戎、李束为、孙谦、胡正等人组成的青年作家群,他们扎根兴县,俯首大地、以笔为犁,耕耘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。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有人们熟悉的《吕梁英雄传》。

1942年冬天,部队精简编后,马烽、西戎、孙谦等人从120师“战斗剧社”来到兴县,转到晋绥地方工作。马烽先后在晋绥边区文艺工作团、文联工作,1944年秋天,调到《晋绥大众报》当编辑、记者,后来升为主编。为了把报刊办得通俗易懂,马烽结合采访工作,经常下乡搜集民间传说、故事,陆续整理发表一些民间故事。1944年12月,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,表彰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的124位民兵英雄。其中有兴县的“神枪手”张候油、“地雷大王”李有年等。大会结束后,《晋绥大众报》准备介绍这些英雄人物,但限于版面,耗时又太长。当时负责报道工作的马烽和西戎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,建议把这些民兵英雄们的典型材料揉和在一起,写成通俗小说在报上连载。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编委会的肯定,社长周文建议他们使用传统的章回体来写。于是,他俩从1945年春开始多方搜集材料,讨论写作大纲,然后分头写作。

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,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,整个根据地缺吃少穿,报社人员每人

每天七两喂马的黑豆。冬天,每人发一身粗布棉衣,到了春暖花开时,需要把棉花掏出来,改成夹衣,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,夏天在蔚汾河洗完衣服,常常赤身守在河边树林中,等晒干了才能穿起来。编辑部没有办公室,马烽、西戎就在北坡村老乡家炕沿、锅台上写小说。稿纸是用麦秆和木兰草制造的土纸印刷的,红蓝墨水是用染布颜料配成的。每到夜深人静,村民们都休息了,他俩还在昏暗的麻油灯下,认真地写稿。烟瘾上来了,便用废纸卷些烟叶掺杂着树叶抽上几口。由于缺少煤炭,住的是冷房,睡的是冷炕,加上吃不饱,穿不暖,许多人染上了疾病,《抗战日报》第一任总编辑赵石宾得了支气管炎并发败血症,因为缺医少药,不幸病逝,年仅28岁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,马烽、西戎写出了章回体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,1945年6月5日,开始在《晋绥大众报》上连载面世,每周一回,每期连载三千字,到1946年8月20日全部刊登完,共95回。这部小说以晋西北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为素材,以吕梁山区的一个普通山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点,讲述了康家寨村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精彩故事,塑造了以雷石柱、吴秀英、孟二楞、康明理等民兵为代表的一组身怀绝技、英勇善战的英雄群像,唱响了一曲晋绥儿女以热血和生命抵御外寇侵略,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赞歌。

小说完全以口语化创作,用传统方式开篇。起头就是四句诗:“抗日卫国保家乡,民兵英雄本领强,配合八路杀敌寇,铁桶江山放光芒。”然后是“四句闲言道罢,引出一件敌后人民杀敌保家的故事,听我从头讲来。”说书味道极浓。小说一面世,马上受到广大民众干部的欢迎。许多识字的人把阅读《吕梁英雄传》作为重要的事情,不识字的人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。马烽、西戎也因此声名大振,成为晋绥边区众所周知的人物。马烽后来回忆说,有一次他到兴县恶虎滩村采访,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,知道他就是《吕梁英雄传》的作者之一时,立即将此消息转告村民。当晚,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,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连载完的故事。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,只好现编现讲,讲了一段不行,再讲一段还不行,一直讲到鸡叫天亮,故事里的敌人被“挤”走,大家才满意地散去了。《吕梁英雄传》的影响远不止此。1946年,周恩来、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,将该小说单行本上册带到重庆,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上连载,引起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。2005年8月,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,由中央电视台、中共吕梁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和山西广播电视台总台,根据长篇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联合摄制的同名电视连续剧,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,再次掀起了人们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小说的热潮。

除马烽、西戎外,当时还有孙谦、胡正、李束为等一批山药蛋派作家,也在兴县进行文学创作,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。在新中国的文学版图上,从晋绥革命根据地一路走来的山西文学,出现了以赵树理为旗手,马烽、西戎、李束为、胡正、孙谦为主将的“山药蛋”文学流派,最后到“晋军崛起”的惊艳亮相,不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并且奠定了山西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底色。我们家乡作家田东照受他们的影响,在写出长篇小说《长虹》之后,又与罗贤保合作写出《龙山游击队》,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43年吕梁山区一支抗日游击队龙山游击队,在敌人蚕食的龙山地区,紧密依靠人民群众,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,终于将敌人挤了出去,使龙山地区重新回到人民怀抱。田东照也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西“晋军崛起”的代表作家之一。

1944年,是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“主动向敌进攻的一年,是胜利的一年”。晋绥边区抗日军民共“挤”掉敌据点106处,收复村庄3108个,解放人口40余万,扩大解放区面积两万五千平方公里。1945年2月,晋绥边区部队又向日军发起攻势作战,首先向离岚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进攻,至5月5日,先后收复方山、岚县及沿线据点七、八处,长达110公里的离岚公路除大武至离石外,全部为我控制。

在我军对敌斗争势如破竹、节节胜利的形势下,国际形势也发生着根本变化:日军偷袭珍珠港后,爆发了太平洋战争,日本国内,政界不稳,政局混乱,人民厌战反战情绪高涨,人力财力物力都极度空虚。在欧洲战场,盟军登陆,开辟了第二战场;8月8日,苏联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。

侵华日军,已是强弩之末,穷途末路,但还进行着最后的垂死挣扎。10月21日,日伪军从忻州、汾阳、静乐、离石调集三千余人,分东、西、中三路,以闪电式的战术进犯兴县。东路从岚县赤坚岭出发,经白文镇奔袭罗峪口。然后沿黄河北上,经桑湾、巡检司、宁乡县川赵家川口、高家村、蔡家崖等地,最后沿峪谷沟到了杨家坡、魏家滩一带袭扰;西路于22日从方山圪洞镇出发,经白文直奔兴县贺家会、张家坪、桑湾、石家吉、赵家川口;中路从岚县东村出发,经白文翻山走吴家塬头、吴儿申,26日经小善畔、西吉,直取高家村。

八路军120师、兴岚游击队、武工队,早已布下天罗地网,等待鬼子进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在这最后一次对日战斗中,兴县人民展现最为壮观的便是“地雷战”。

早在1943年9月10日,中共晋绥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,提出“劳武结合”方针,林枫书记讲话号召学习冀中军民斗争经验,开展群众性的爆破运动。二十里铺民兵中队长李有年,就组织民兵在曲家沟建起了军火合作社,有两座铸铁炉,制造地雷壳,派出民兵到白家沟、黄辉头挖硫磺矿、扫硝土,上山烧木炭,造出了一颗颗地雷。兴县武委会、抗联在全县推广二十里铺民兵中队长、“地雷大王”李有年的经验,发动民兵土法造雷,创造了“连环雷”“拉雷”“母子雷”“滚雷”,还试制成功了石雷。民兵们曾编唱了这样一首歌谣:

铁蛋蛋,石蛋蛋,中间有个圆眼眼,  
装上土炸药,安上爆火管,  
黄土封好口,拉线留外边,  
鬼子来扫荡,送他上西天。

伴随着造雷运动的歌声,广大民兵和群众在敌人扫荡线上,无论是大道、小路,还是河滩、门口,到处布满了地雷,这一次又给鬼子以沉重打击。从1944年10月22日起历时半月内,八路军、游击队截击日军400余次,引爆地雷350多颗,死伤日军1500余人。日军残部个个如同惊弓之鸟,一打就退,而且不敢走大路,也

## 夺取抗战最后的胜利

——晋绥首府印象记(二十九)

□ 牛寨中

不敢走小路,专走山坡河道。11月17日,只得向岚县、忻州方向撤退。当溃退到二十里铺、阳会崖一带,又遭遇李有年的连环雷,炸得鬼子人仰马翻。卧牛山上瞭望哨的民兵高兴地说:“李有年,实在威,村口埋下连环雷,炸得鬼子满天飞”。至此,兴县军民反“扫荡”、反“蚕食”战斗宣告结束,到1945年8月,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。

但同时,兴县人民也作出了令人悲痛的巨大牺牲。

日本鬼子从1940年至1944年,六次“扫荡”兴县,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、抢光、杀光的“三光”政策,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案,给全县人民造成无法挽救的灾难和损失。根据县政府1945年8月统计,全县被日军烧毁房屋68580间,烧掉门窗5200多副,破坏明、清时期的寺院、庙宇、庵观、祠堂等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30多处,抢走和烧毁粮食2000余万公斤,抢走牲畜2500多头,宰杀猪、羊、牛5000多头,鸡鸭上万只,抢走银圆13000多块,金银首饰、珠宝玉器、衣物绸缎无数,毁坏家具无法统计。更令人发指的是,全县有2393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,700多名男女青年被日军抓走,下落不明。

红色吕梁

